

September 2021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The Controversies on Lydia H. Li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Beyond

Shi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Shi. 2021.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The Controversies on Lydia H. Li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Beyo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5): pp.207-2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5/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化研究与美国华人学者的知识谱系

——从刘禾的“国民性”争议谈起

李 石

摘要：刘禾对鲁迅国民性话语的批判其实不是一次个别性的文学批评，而是其“被译介的现代性”的理论游牧的一部分。不管是刘禾的“被译介的现代性”、李欧梵的“追寻现代性”、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周蕾的“被压抑的视觉性”还是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其理论旨趣往往倾向于从权力批判的角度，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反思现代民族国家背后的“压抑性政体”。这一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跟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一种同构性，而且在跨文化的理论旅行中暴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理论游戏”被推演到极端，则会陷入语言游戏的循环怪圈，被理论预设所支配，从而无法真正抵达文学文本的经验和问题；二是美国华人学者与文化研究的亲缘关系，导致其极大地依赖于对西方文化理论方法的游牧式“猎取”，这也是其能够在国内学界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增强以及知识共享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知识群体面临着提升理论原创性的挑战。

关键词：美国华人学者；文化研究；国民性；理论游牧

作者简介：李石，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文系，510275。电子邮箱：lishi3@mail.sysu.edu.cn。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65]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The Controversies on Lydia H. Li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Beyond

Abstract: Lydia H. Liu's criticism on Lu Xun's discourse of national character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in literary criticism, bu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nomadism of "translated modernity." Be it Lydia H. Liu's conceptualization of "translated modernity," Leo Ou-fan Lee's "pursuit of modernity," David Der-wei Wang's "repressed modernity," Rey Chow's "repressed visibility" or Shu-mei Shih's "lure of the modern," the theoretical purport of theirs tends to 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criticism, and reflect on the "repressive regime" behind the modern nation-state. The formation of this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is isomorphi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nd it exposes two issues in the cross-cultural theoretical travel.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when the theory game is pushed to the extreme, it falls into a loop of discursive games and is dominated by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Such discursive game fails to delve into the real experience and core questions of the literary tex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kinship between works of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and cultural studies has led to their great dependence on the nomadic "hunting" of Western cultural theories and methods, which results in their influence in Chinese domestic academia. However, thanks to the accent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subjectivity and more extensive intellectual sharing, this knowledge group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enhancing its own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Keywords: American Chinese scholars;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etical nomadism

Author: Li Shi, Ph. D.,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135 Xingang West Road,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lishi3@mail.sysu.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18ZDA265).

—

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不仅表现在理论译介层面上,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学术论争而得到深入的渗透、传播和接受。在国内,围绕着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所引起的学术讨论和争议,恰是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一次理论旅行过程。

关于美国华人学者刘禾的“国民性话语”论争,最早起源于文学杂志《收获》所发表的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2000年第2期)一文,这篇文章试图证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一方面的确对激励民族自省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国民性”概念在其产生之初,就充满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方主义”歧视和偏见。这篇被视为贬损鲁迅的文章很快引来巨大争议,而且较早的回应文章,如张全之的《鲁迅与“东方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就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待冯骥才对鲁迅的批判。但在2002年,杨曾宪发表《“质疑国民性神话”》一文,指出冯骥才的文章其实是在美国华人学者刘禾的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下写成的。尽管目前暂无明确证据表明这种直接影响关系,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在核心思路和观点上,与刘禾最早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的确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评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人们的批判性反驳。^①

不过,这次国民性话语论争的转折,出现在贺玉高发表于2016年的《“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篇论文重新梳理了此次论争的来龙去脉,对其中国学术语境中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和误读,而且,误读的深刻原因在于国内学者包括刘禾本人都受到了长久以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支配和影响。更重要的是,贺玉高将国内学者对刘禾的批评视为启蒙主义派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因为“刘禾是在否定西方的基础上肯定鲁迅的,而批评者是在肯定西方知识的基础上肯定鲁迅的”(贺玉高42)。在贺玉高看来,这一分歧正是刘禾的国民性话语受到国内学者的群体性误读的更为根本的原因。由于陶东风对刘禾的批判也被贺玉高划归为启蒙主义派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因此,陶东风撰文对贺玉高进行回应性的批评。在《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中,陶东风否认其对刘禾的误读,而且在更为细致解读刘文的基础上,揭示了刘禾的诸多矛盾之处。他认为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呈现出一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拜物教和知识论虚无主义。他说:

我和刘禾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

在于是否承认国民性话语的西方影响,而在于这种影响达到什么程度,除了西方影响,国民性是否还有中国本土知识、特别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更重要的分歧是:我认为国民性话语的“出身”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国民性的事实以及这种国民性是不是应该批判,换言之,我认为国民性的事实比国民性话语的“出身”更重要,而刘禾的态度正好相反:不问事实只问出身,因为在她看来事实根本就是话语的建构物[……]刘禾文章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导致了知识论虚无主义,从而无法谈论一个实质性问题:国民性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它到底存在不存在?(42)

本文认为,陶东风这篇新近的回应文章将国民性话语论争推到了一个新的学理高度,尤其在揭示刘禾的国民性批评悬置事实经验以及用话语权力替代事实判断等问题上是一针见血的。但是,在刘禾的“国民性”争议中,始终有一个视域盲区受到批评者的忽视,那就是,刘禾对鲁迅的后殖民批评何以如此偏重于考察话语的知识生产过程,乃至在理论实践中以悬置事实和判断为代价?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与其跨语际实践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刘禾不作为美国华人学者,其后殖民批评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是什么关系?而她的批评实践所产生的问题是个人性的,还是文化研究乃至美国华人学者文化批评实践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当然,陶东风、贺玉高等人的文章都提到刘禾的美国华人学者身份,但是基本没有对这一身份背后可能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

二

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关于国民性话语论争最早的起点,就是刘禾所发表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其在1993年被陈平原主编的《文学史》第一辑收录。^②巧合的是,美国华人学者在中国香港所发表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两个文献,时间同样也是在1993年。这两个文献,一个是李欧梵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③此文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以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李欧梵发现了报纸副刊对于中国晚清社会逐渐开辟的言说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并开启了海内外学界对“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以及国内的报章媒介文学研究。1997—1998年,国内学者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中、下三卷)和第四卷《批评空间的开创》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一文集收录了不少美国华人学者的

批评文章,而且第四卷《批评空间的开创》正是对李欧梵文章题目的直接借用,其意义不言自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不仅是对晚清文学与文化生态的一种概括,也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空间的开拓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个文献,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这本书收录了刘再复、刘禾、黄子平、孟悦、林岗、戴锦华、马军骧等海内外不同学者的批评文章,并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尽管具体观点和论说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是以西方文化研究和“反现代的现代性”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尤其对使经典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经典的评价方式进行批判性重读,从而与80年代国内学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构成了一种冲击和对话关系。这同样也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反响。2007年,这本书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而在国内学界正式亮相,并增加了周爱民、贺桂梅、李杨等国内学者的文章。

上述三个学术文献在发表时间上的同时性,并非偶然与巧合,而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正好是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在中文学界大规模传播和接受的初始阶段,而美国华人学者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性作用。之所以说是初始,一方面是因为在9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大规模译介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那个阶段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化批评实践,跟后来偏重于泛文化现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不同,更多地接近于美国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策略,其研究偏重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因此,无论是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李欧梵对晚清现代性的发掘,还是唐小兵再解读思潮对红色经典文本的批判性解读,都被划归为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以至于后来国内学者在梳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时,都普遍忽略了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但不应忽视的是,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正好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特征。换言之,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尽管理论面向和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整体上却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批判性解构精神。比如李欧梵对晚清文学和文化生态的关注背后,包含着对过去将晚清与腐朽封建的文化进行等同的僵化文学研究模式的解构;唐小兵的“再解读”则是对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话语生产过程的重新审视;而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暂且不论其批判策略是否妥当,其意图同样是试图解构某种话语“神话”。

事实上,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美国华人学者,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对这一知识群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从文化研究的整体视角来概括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美国华人学者的特征和倾向,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一种跨学科同时也是去学科化的属性,学科的交织、方法的繁复让我们很

难用确定的概念和词汇来形容和概括它,或者说,文化研究本身就是拒绝被定义的;另一方面,在美国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华人学者并非一个具有学院传承性质的知识群体,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个性和独立性使我们很难在整体上对他们作统一的定性。但是,美国华人学者在文化研究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属性却又不是没有共性的。他们立足于美国学术界,同时,其学术成果通过译介和出版返回中国学界,由于一种“彼岸性”的文化预设和期待,这些学者总是容易被视为一个学术群体(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被接受和批评。我们从李欧梵、唐小兵、刘禾等学者的相关著作或文章在海内外的学术轨迹中可以看出,这一知识群体是随着90年代以来中西方学术互动的不断增强而受到国内学界的热切关注的,其对国内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地引起学术上的争议。

李欧梵在《理论于我有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中,讨论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一理论转向背后的深刻历史语境。^④王德威也注意到,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在王德威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以作家、文类、作品、现象、运动等研究为重点,这方面以60年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重要开端,以70年代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及其鲁迅研究为高潮;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开始转向文化研究。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这方面以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1990)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评等方法的融合最具有代表性;二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脱离传统文本、文类、作家研究,而走向不断越界、跨学科的趋势,如张英进的电影研究,刘康、王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贺麦晓的文化生产,李欧梵的城市研究,陈建华的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文学等;三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重述历史有着自觉的意识和热情,比如王德威的晚清文学现代性、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及相关现代性问题的探讨等。^⑤也就是说,美国华人学者在推动国内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样也发生在这一知识群体内部,因其与西方学界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发生得更早一些。

三

整体上,受文化研究的影响,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一是抛弃新批评那种封闭式的文本阅读,重新回到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中;二是借用西方文化研究的众多理论资源,将其作为进入文本的重要方法、视角,并讨论文本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三是华人学者的边缘学术身份及其开放性的文化研究策略,往往具有颠覆主流学术话语的意图,进而对国内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不断地游走在理论和文本之间,以极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在跨学科和跨界阐释中冲击和解构僵化的学术体制和固化的思想观念,是美国华人学者对于国内学界而言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和意义。与此同时,他们的理论生产也极大地依赖于不断地设置可供引起论争的学术命题和概念,不断地转移其理论批判和“碰瓷”的目标和对象,从而根据现实语境,权宜性地调整自身理论立场、表述方式和抵抗策略。

因此,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批判其实不是一次个别性的文学批评,而是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而完成的“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操练和延伸。考虑到刘禾也是“再解读”的重要作者之一,那么强调鲁迅的神话地位(尽管事实或许也是如此),并试图对“神话”进行批判性的解构,就构成了作为文学批评的“再解读”的一次理论生产和话语实践。在《跨语际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刘禾对知识考古学和后殖民理论的熟练运用,她试图关注跨国文化交流中作为中介的语言实践的细微而复杂的互动过程。她说:

我将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通常是以日语为中介)之间广泛的接触/冲撞[……]我要做的就是将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象的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总之,我们关注的是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合法化过程、喻说以及叙事模式,因为自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代经验的历史条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刘禾 2—5)

在刘禾看来,在历史的起源节点上,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并不是一种现实的物质经验,而首先是一种被译介的、在话语的支配和影响下所生成的“想象”。而她试图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去考察和解构“现代性”话语的具体生产过程。这种知识策略,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她对文学理论的话语效力的关注上,即文学理论话语如何支配和影响了文学实践。在这样的视角下,刘禾对萧红的《生死场》的“再解读”,就不仅仅是对作家和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是对围绕着《生死场》所进行的文学理论话语的批判性解读。由此,鲁迅对《生死场》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文学评价,在刘禾的女性主

义解读中,则是在“民族兴亡”的视角局限下对萧红的误读(唐小兵 12)。换言之,萧红在《生死场》中所呈现的女性身体经验,是被文学批评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所压抑和遮蔽的。因此,重读现代经典文学文本,其实是重读构成经典文本的话语阐释本身。在这里,试图确定重读文本的意图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对经典化本身的“读神”式的理论话语解码过程。

在另一篇文章《〈新文学大系〉的制作》中,刘禾以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的总序为例,试图揭示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借助西方文化的权威来奠定精英文学的经典性与合法性。在刘禾看来,西方理论对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其实根源于他们的内在需要,因此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则成为一种主动的自我文化殖民行为,“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意义的终极权威”(刘禾 267)。这个经典化过程,涉及理论的话语操作(理论通过生产自身的合法性术语,并不断地复制、繁殖、扩散)对于新文学经典的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种批评策略和观点立场,其实早在刘禾最初对鲁迅国民性话语进行批判时就演练过了。她在《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中,引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到访中国后谈论中国人国民性的一段文字:

在我离开中国前不久,一个著名的中国作家坚持要我说出我认为是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我勉强地提到了三点:贪婪、懦弱和麻木。说来奇怪,我的对话者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有道理,并接着讨论可能的补救方法。这个知识分子的诚实正直,恰好展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美德之一(Bertrand Russell 209)。

在刘禾看来,罗素对中国人“贪婪、胆怯和麻木”的批评,不仅“沿用了19世纪传教士创造的知识模式[……]深陷在这些概念的泥淖中”,更为重要的是,她认为这段话“表现了一种奇特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她说:“罗素的身份是占有知识的哲学家,那位中国作家则扮演的是从西方人那里索取知识的角色。有趣的是,他索取的知识不是关于西方人的,而是关于自我的认识。尽管他可能是本着旁观者清的谦虚态度行事的,但在罗素的叙事中,这种知识的合作不能不建立一种权力关系,它使中国人变成被叙述、被批评、被教导或被赞美的对象。作为知识赐予者的罗素,则在这一‘合写’的文本中,加倍巩固了他自己的主体地位。”(陈平原 150)刘禾将罗素和中国作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易”,这种过于主观的、诛心式的观点跟她将知识分子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行为视为“主动的自我文化殖民”如出一辙。在这里,本文并无意于像以往的批评者那样对刘禾的观点进行反驳或辩护,而是提醒一个被人们忽略但又值得

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批判,是其跨语际实践和“被译介的现代性”的理论游牧的一部分,是服务于文化批评的知识生产机制。这种知识生产机制的本质,是一种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的解构性的阅读策略和知识政治。

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指出,“阅读”是一种现代性行为,本质是一种“偷猎”。在德·塞托看来,阅读行为的形成跟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普及来启蒙和教化大众有关。随着书面文字对大众阅读行为的塑造,“阅读”本身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如果说,在严格的文化等级体制中,书籍和思想的阐释权只能被赋予特定的阶层,他们作为官方乃至正统的维护者,以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来确立阐释的界限,并排除一切与正统对立的异端思想,从而使对“文本”的解读变成一个“禁猎之地”(米歇尔·德·塞托 249),那么,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兴起,教会掌控力量的削弱以及市场大众的形成,导致读者的阅读行为逐渐显示自身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书籍出版、报纸刊物甚至影视媒介的出现,使以往的文化正统性遭到读者创造性的逐渐瓦解,而阅读活动也逐渐从只属于特定群体,比如神职人员的传教或者学者的文学批评,扩展到消费文化的传播空间。

依托于美国学院机构的华人学者的文化批评,正好处在阅读权力逐渐解禁而又区别于能动性更强的大众消费式阅读之间,是一种精英式的现代性阅读(批评)政治。事实上,“现代性”正是美国华人学者的理论批评实践的核心议题。不管是刘禾的“被译介的现代性”、李欧梵的“追寻现代性”、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周蕾的“被压抑的视觉性”还是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其理论旨趣往往在于从权力批判的角度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反思现代民族国家背后的“压抑性政体”。这种解构性的批评策略,离不开对理论和文本的双重“猎取”。从理论层面看,西方众多批评理论,包括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知识考古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都成为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的精神资源。这种“猎取”行为导致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呈现出越界的、跨学科的“游牧性”特征。从文本层面看,不断跨学科的、越界的理论“游牧”,其实同样也是对研究文本的不断“偷猎”。如前所述,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转折,就是从夏志清开创的以现代文学作品为核心的批评范式,转向一种泛文化批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其实这种转变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不断游走在两者之间各取所长),使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断扩大,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以文字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创作到视觉性图像和影视作品,甚至到城市文化等泛文化现象。^⑥

正因此,理论的游牧性使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成为一种在特定理论预设前提下的话语实践。而且,这

种理论批评模式并非偶然状况。比如,在“华语语系”概念的理论生产中,史书美试图在视觉文化的语言权力斗争的视域下,强调一种“差异的政治”。在这一理论思路下,史书美表面上强调拒绝将“中国性”视为一种“无法回避的、本体论的、先验的状况”^⑦,但在其“华语语系”的理论体系中,“中国性”又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他者”受到排斥。正如汤拥华所提及的,“华语语系”的立场和视角的转换,不一定是符合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的。“事实就是,有关‘本质’或者‘中心’的叙述,很多时候只是被实用主义地使用,也就是说,对一个真实的华人来说,他可以拒绝任何‘根’,也可以接受所有的‘根’,还可以权宜变通地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归属,但这只是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未必就能产生实际的区分。”(汤拥华 63)也就是说,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概念表面上试图维护差异性和个别性事物,但是这种知识政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设计,只能在一种抽象和形而上的意义上起作用。它表面上关注少数社群,但其实并未真正深入社群(当然要做到真正地介入不同族群的生活其实是极其困难的),表面上关注语言的政治,却很少试图进入根植于社会历史演变的方言以及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内层,因此无法逃脱“理论生理论”的窠臼。

四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化批评都存在忽视事实和经验的问题。比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其实跟英国伯明翰学派对物质经验的研究传统存在渊源。他说:“也许我以前受到过历史学的训练,觉得老写作家作品不过瘾,所以才开始探求上海的都市文化的本源,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理念,那就是物质文化对现代性的影响,比如上海的街道呀、建筑呀、商业、电影、印刷等。如果说我有一种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这和我以前学的思想史完全背道而驰,思想史很重视 idea,就是思想、观念,对思想本身、观念本身怎么演变十分重视,相对来说忽略了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就是物质文明,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商品,也就是‘声光电’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上海人对现代意识的接受,并不是先从思想上,而是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接受的。”(356)李欧梵的都市文化研究,可以说比较接近伯明翰学派对社会之“物”的考察和分析方式。而他本人也多次表达过对于借用理论而主观武断地阐释文本的批评。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性的问题:如果说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起源,是继承了从尼采到福柯对形而上学的疏离和解构,从而将理论的视野扩及对经验性事物的关注,那么,何以美国华人学者的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又存在着偏向理论话语而忽视事实和经验的倾向?这就涉及文化研究,特别是美国文化研究谱系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在理论现代性分化下,西方文化研究有着复杂多样的理论渊源和传统。它既包括英国伯明翰学派立足于实证主义和物质主义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关注,也包括继承了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者对文化媒介变迁和工人阶级关系的考察,整体上倾向于将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能动性的存在,而后者则更加注重批判大众文化的物质性扩张对精神性生活带来的冲击。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面向和批评策略。而且,文化研究还经历了从欧洲向美国的理论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过程。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研究重要代表的约翰·费斯克和亨利·詹金斯,尽管有伯明翰学派的影响痕迹,但是在肯定大众的能动性方面比伯明翰学派走得更远。

文化研究从欧洲传播到美国的发展路径,既离不开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迁移背景,同时也跟理论现代性分化进程中“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篇就慨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消失。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之后的一个明显理论发展趋势,在于原创性的理论不再产生,而不断被生产的,是对那些原创性理论的运用和阐释。“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他们发展、增加、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的观点。那些有能之辈,构想出女权主义、解构主义,那些无能之辈,则将这些深刻见解运用于《白鲸记》或《帽中猫》,但是新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伊格尔顿 4)因此,所谓“后理论”,可以理解为理论运用过程中的理论增殖和内爆,它内置于学院运作机制的理论生产过程。而且,由于“后理论”倾向于对理论进行消费式的话语实践,而常常面临着“理论终结”(更准确地说是指理论原创性的终结)的诘问和批判。不过,大卫·波德维尔似乎并不认同“后理论”意味着理论的困境。他将理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包含着拉康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等“大理论”的结合体和变异体。与此同时,他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将“大理论”放在电影理论发展的框架中审视,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理论”的来临,尽管使得理论终结了,但却为具体的批评理论的分析 and 阐释提供了思想资源。大卫·波德维尔指出:“一些电影作者争论性地将‘理论’的唯一替代品描绘成一种盲目的、低级的‘经验主义’,只会挖掘事实。但这始终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无须在实践拉康主义和编纂电影记录之间作出选择。过去十年的学术研究表明,与理论相抗衡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一种中间性质的研究,它可以很轻易地在证据体系和更普遍的论点及含义之间进行转移。”(David Bordwell xiii)这段话其实是

为理论的内爆、分化以及消费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说呈现了后理论的时代症候。陈晓明认为,欧美的文学批评经历了被文化批

评所取代的转向过程。而文化批评则是指“广阔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性别身份研究、流散研究等更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批评视角”(陈晓明 51)。陈晓明还特别提到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批评那些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形成的各种流派”(陈晓明 51),以此强化一种文化研究崛起以及文学批评衰落的印象。但是,从“后理论”的视角来看,文化研究其实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欧美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指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它既包括以利维斯、阿诺德为代表的批评传统,也包括以美国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而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学批评实践,可以说是以文本细读为核心方法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结合。甚至可以说,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并非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而更偏向解构主义式的文本细读批评策略,而文化研究不过是可供其借鉴运用的丰富理论资源。

美国华人学者周蕾从“欧洲理论在美国”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在她看来,欧洲理论(主要是法国理论)向全球的传播和接受(也包括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迁移),正是其具有普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更准确地说,法国理论的影响力要归功于英语的全球化扩张,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其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中所经历的混杂、融合与蜕变。但是,美国知识界对法国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一直以来却被认为“充其量只是扮演一个(眼界狭隘、头脑简单)而志在营利的商人,把学术活动像其他东西一样包装成上市流通的商品”(周蕾 39)。周蕾试图肯定的是理论之后理论实践(即便是理论消费)的可能性,她说:“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提出后设语言的概念,赋予意义新的定义:意义乃是在后设语言中,由能指与所指之间虚构而精确的对应关系构成的表意链所制造出来的重复效果;后结构主义借由强调意指作用的运动是后设语言维持指涉性运作的关键,形成以意义(变动)为基础的批评主轴。”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尤其关注“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符号运作,进而使这些意义不再被视为单纯或自然的”(周蕾 100)。这种语言策略如果放在刘禾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批判中,也是毫不违和的。

五

由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策略导致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呈现出鲜明的“理论游戏”特征。理论游戏的本意,一方面是理论分化和价值多元化的重要表征;但另一方面,理论游戏又极大地强化了阐释者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一旦推演到极端,则会陷入语言游戏的循环论证的怪圈。正因此,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呈现出来的优势和缺陷都是很明显的。在晚清文学现代性、再解读、华语

语系、跨语际实践等多个领域,美国华人学者都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开辟了新的文学批评的空间,也对国内文学研究范式乃至学术体制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上,理论游戏体现为不同的话语策略的选择。比如“重写文学史”与“再解读”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其核心问题就是对文学经典评价标准的话语权争夺。但是,美国华人学者在解构意义生产的符号运作时,往往陷入对语言和概念的不断演绎和分析中,而不能抵达文学的经验和问题。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西方的形而上学进行解构,它将人们的思考视角,从对上帝、宗教、本体论哲学的玄冥思想转移到对具体的、差异性的“物”的关注,也就是从永恒的天国转向世俗之物。体现在文学批评上,就是对文学本质性问题的抛弃,而试图从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语境等角度来理解文学的存在方式。但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游戏让我们发现,其不过依然沉浸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操作之中,它比起其一直试图撇清关系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那种缠绕在封闭式文本内部的阐释,其实并没有走太远。^⑧陶东风以“话语拜物教”和“知识论虚无主义”批评刘禾,正是因为刘禾的文学批评明显受到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的支配。

无独有偶,另一华人学者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概念也同样是在一种“压抑性政体”的理论预设和前提下,而实现其理论生产和增殖。这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还有周蕾的文化批评。在周蕾看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由于受到激进理论的影响,而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那种“完善而封闭的、精细的文本研究传统”(Rey Chow 31)。但她在具体的批评阐释中,却又落入自身所批判的精细文本研究,她的批评理论呈现出对电影视觉文本的无休止的阐释和论证热情。而支撑着周蕾进行文本分析的,则是对各种不同理论方法的借用。^⑨因此,理论游戏所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批评也具有了“文学性”,其文学性甚至压倒了对文学文本的文学性阐释。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中指出,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将各种理论资源都纳入具体的阐释活动,就在于文学本身具有一种综合性,它是人类经验的解释和表达。因此,对人类的经验和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就容易引起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强烈兴趣(Jonathan Culler 11)。但有时候,文化批评的理论游戏,会导致理论陷入语言游戏的形而上学惯性,也会在它进入“物”的过程中无视“物”的本来面貌,而只是撷取符合自身理论预设的碎片化“证据”来佐证其理论推演的观点。换言之,文化研究的反思性批判逻辑导致理论的主体性不断扩张,阐释权不断增强,从而使学术阐释极大地依赖于对理论和文本的攫取。而理论主体性的扩张走向极端就是吞噬文本、蚕食文本,让文本为自身的理论预设服务。

其二,理论游戏成为可供效仿的知识生产机制,是通

过全球化时代的媒介运作来完成自身的知识迁移和理论旅行的。这种理论旅行不仅包括文化研究从欧洲向美国传播发展,更重要地,还包括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逐渐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重大反响,一定程度上是在于美国华人学者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中介,并以差异化的视角,为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活力。而且,这一知识群体整体上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身份转移过程。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那么,美国华人学者的“边缘性”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从人生际遇看,他们大都是从中国远赴美国读书留学,这本身就是背井离乡的自我边缘化过程,也是对中国主流文化群落的离心过程。从学科处境看,这一知识群体大都是在美国高校的东亚系或比较文学系中担任教职,相对于美国的主流学界而言,同样也是边缘化的知识群体。可以说他们处在一种“双重边缘化”的境况。但是美国华人学者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消费和游牧式猎取,又体现出他们试图融入西方学术主流和中心的意图和愿望。这也为他们带来了一种“双重中心化”的位置变化过程,一方面表现在美国华人学者对西方主流学界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批评过程的敏锐捕捉和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学界而言,美国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此海内外频繁的学术互动让他们的批评实践得以借助跨文化传播重新回归大陆,并成为一定时期学术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当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译介和研究力量的崛起,美国华人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上,已经不再具有曾经的影响力。甚至随着中国本土主义思潮的崛起,人们对西方理论的态度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无理地接受和吸收,而越来越具有反思性,如此一来,美国华人学者相关方面的理论优势也就有所减弱。

由此,重新反观刘禾对鲁迅的批判在国内引起的反响。贺玉高将之视为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知识界的理论旅行过程中的群体性“误读”,并认为这种群体性误读的根源在于启蒙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而陶东风对刘禾的批判,也被认为是“启蒙主义派”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问题是:启蒙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关系是二元对立吗?一方面,陶东风确实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且其对刘禾的批评也确实客观上是对启蒙主义精神的一种辩护,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陶东风是在反对后殖民批评。作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者,陶东风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是以后殖民视角来讨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另一方面,陶东风立足于康德与福柯,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这两者在批判“独断论”和“总体性”层面是相

通的。他说:“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既可以用来解构殖民主义——从而发展为后殖民主义批评,也可以用来解构其他以‘绝对真理’面目出现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陶东风 46)仅从这段话看,似乎陶东风与刘禾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策略又存在着相通之处,因为刘禾是将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以及后人对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神化”视为一种“先验”的、类似于“绝对真理”的神话符号进行批判性解构的。而且如前所述,王德威、刘禾、史书美、周蕾等学者的批评实践,在知识谱系上都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巨大影响,^①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某种程度上也就共享着一种对压抑性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理论策略。因此,从立场或派别的角度来看待陶东风对刘禾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而且,尽管陶东风明确表示他并不“那么后现代”,但他对刘禾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对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的完全否定,毋宁说他批判的是那种只遵从特定的知识生产机制,而不考虑客观现实和经验的批评方式。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一种象征性意义上看陶东风对刘禾的批判。换言之,这是对一直以来在中国学界取得中心话语地位的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审视和反思。近年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美国华人学者进行的学术反思和批判逐渐增多。^②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整体上,国内学者的反思和批判往往跟理论适用性、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主体性建构密切相关。应该认识到,美国华人学者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存在着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神话化”倾向,这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理论方法的游牧式偷猎。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研究与中国知识界之间,美国华人学者一直扮演着一种“中介性”角色,这个身份某种程度上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也就是说,美国华人学者的真正价值的体现,更多还是取决于西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对于国内学界的吸引力,而非这个知识群体本身的学术创造力。这是因为,美国华人学者的“中介性”角色能够起到理论桥梁的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内学界对西方理论持续保持着追新逐奇的动力和需求,二是全球知识传播和迁移的不同步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巨大提升以及知识共享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会弱化美国华人学者文化研究的中介性功能。因此,当“中介性”功能被穷尽之后,如何立足于具体的文学文本、事实和经验来真正提升理论的原创性,或许将成为美国华人学者的理论批评实践所要面临的问题。

注释[Notes]

① 这些文章有,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话”,《吉首大学学报》1(2002): 59—66;汪卫东、张鑫:“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概念”,《鲁迅研究月刊》1(2003): 65—73;王学钧:“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南京工业大学学报》1(2004): 48—53;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

神话”,《甘肃社会科学》5(2006): 21—24;等等。

② 后来,这篇论文先后经过合并和删改,并被收入不同版本著作在国内出版,如《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2014年修订译本)。

③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李欧梵在国内出版的论文集《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王宏志等译。

④ 该文为季进、余夏云合著的《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的序言。

⑤ 参见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4(2006): 132—136;“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张清芳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07): 1—5。

⑥ 当然,研究对象和领域的越界程度,在不同学者的学术论述中是存在差异性的。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夏志清的新批评传统及其古典趣味使其既不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现象,也对文化研究理论相当漠然。李欧梵虽然师承夏志清,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可以说是游走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及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吸收借鉴之间。因此,他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耕耘多年,而且在美国和香港两地教书和生活的都市经验使其学术研究的对象不断地拓展到对都市文化的考察和批评。他的著述不仅有理论性的文章,还有更多散文和随笔性质的文化评论。唐小兵,最早是其博士论文研究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性思想,他的“再解读”实践思路则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社会主义文艺包括文学作品、话剧、影视改编、图像、版画,等等,后来又拓展到现代木刻以及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周蕾、史书美、张英进、鲁晓鹏等人则开拓了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新领域。刘禾从“跨语际实践”进入电子媒介研究(比如于2010年在芝加哥出版社出版《弗氏机器人:数字媒介与无意识的未来》*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相对而言,王德威是美国华人学者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有学科意识的,尽管他游走于美国与大陆学界,并不断提出和推进“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最近又提出“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开启别一种思考维度)、“华语语系文学”等问题和概念的理论论争与生产,但是贯穿其学术研究(包括他在多篇文章里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史的介绍和梳理)的始终是一种清晰的现当代文学史意识和学科意识。

⑦ 参见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庆华译,蔡建鑫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68页。值得一提的是,史书美的这句表述在思路跟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是相类似的。刘

禾将国民性理论视为一个“现代性”神话,并将之描述成一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8页。

⑧ 有学者指出,主流反形而上学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后裔,这个观点也可用来说明文化研究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参见陈开晟:《德里达后文学性接受的批判与发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0。

⑨ 本文认为,周蕾对鲁迅的幻灯片事件的阐释也存在过度阐释之嫌。在“被压抑的视觉性”预设下,周蕾从幻灯片事件中看到的是媒介视觉暴力对鲁迅的影响。而视觉之所以会被体验为“暴力”,乃是因为20世纪的媒介变革很有可能褫夺以文字写作为核心的文学的传统地位,从而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受到威胁。在周蕾看来,鲁迅对“弃医从文”的解释,不过是试图用文字语言来重新表述这一视觉经验,而后世对这个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的痴迷,同样显示出以文字优先的文化秩序,从而,幻灯片事件背后的视觉意义被压制了。但是,鲁迅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主要以短篇小说和犀利的杂文为主的事实,说明了“被压制的视觉性将重新浮现并从内部改变关于写作和阅读的观念”。不得不说,这种分析堪称精彩而且难以反驳,但却并无史料文献的佐证。仅仅从一个幻灯片事件及背后的媒介意义出发,并借用海德格尔、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来生发新的阐释和分析,显得主观和臆断。参见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第27—34页。

⑩ 王德威也是较早将福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学者。他在中国台湾翻译出版了《知识的考掘》(知识考古学),于1993年由麦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个译本还附录了两篇他的关于福柯的介绍文章作为导读,分别为《论述傅柯》和《“考掘学”与宗谱学——再论傅柯的历史文化观》。两篇文章此前以《浅论福寇:语言、陈述、历史》和《“知识考掘学”与“探原研究学”:再论福寇的历史文化观》为题分别发表在台湾期刊《中外文学》1983年第11卷第8期以及1984年第12卷第12期上。

⑪ 这些文章有,朱立立:“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写《在家国以外》”,《文艺研究》9(2005):136—143;朱国华:“别一种理论旅行的故事——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理论的中国再生产”,《文艺研究》11(2010):36—146;王晓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美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3):19—29;陈林侠:“是文化,还是政治:审视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4(2010):14—19;李道新:“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当代电影》8(2014):53—58;等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ordwell, David, and Noel Carroll. eds. *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 The Art of Practice*. Trans. Fang Linlin and Huang Chunli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陈晓明:“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文艺理论研究》6(2012):44—52。

[Chen, Xiaom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American Deconstructionism and Its Recep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6(2012): 44—52.]

周蕾:《世界标靶时代:战争、理论与比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陈衍秀译。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Chow, Rey. *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 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 Theory, and Comparative Work*. Trans. Chen Yanxiu. Taipei: Chengbang Culture Co., Ltd. 2011.]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欣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文艺理论研究》6(2016):37—45。

[He, Yugao. “The Debate o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Binary Mindset in Contemporary Intelligentsi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6(2016): 37—45.]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Trans. Mao Jia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Liu, Lydia H. “Text, Criticism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Revelation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Reinterpretation: Mass Culture, Popular Arts and Ideology*. Ed.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8]

——:“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文学史》(第1辑),陈平原、陈国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8—156页。

- [---]. "The Origin of A Myth of Modernity: Questioning the Discourse on National Character." *Literary History*, Vol. 1. Eds. Chen Pingyuan and Chen Guoqi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8 - 156.]
- : 《跨语际实践: 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宋伟杰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
- [---.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 1937*. Trans. Song Wei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 《跨语际实践: 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宋伟杰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
- [---.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 1937*. Trans. Song Wei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92.
- 汤拥华: “文学如何‘在地’? ——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 《扬子江评论》2(2012): 58—67。
- [Tang, Yonghua. "How Can Literature Be 'on the Site'? — On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by Shumei Shih." *Yangtze River Review* 2(2012): 58 - 67.]
- 陶东风: “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 《文艺理论研究》2(2019): 36—48。
- [Tao, Dongfeng. "Has Lu Xun Subverte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2019): 36 - 48.]

(责任编辑: 赵 勇)

· 书讯 ·

《他者的声音——反思后殖民理论的二元结构》

作者: 张春晓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年7月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后殖民理论的二元结构,即研究中常见的东/西对立、主体性困境、再现的话语—权力所共同分享的逻辑内核,考察诸多有代表性的后殖民学术如何回应这一难题并发展出不同的理论面貌。二元结构自从萨义的奠基性研究开始,就体现为一系列颇具辩证张力的两难。笔者将其追溯至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基础,并尝试援引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加以澄清,继而又带着对这一结构的自觉返回后殖民研究:斯皮瓦克运用解构批评揭示边缘主体的(不)可能性,标识出表述/再现的极限;霍米·巴巴则承认二元结构的同时转换重心,思考一种新的含混的主体性;阐释学和西方主义则以退守或复制结构的方式,进行某种反话语的生产。本书尤其关注中国近三十余年来后殖民学术研究的发展,考察其语境、方法论和价值立场,从跨文化形象学与跨语际实践中,可以看到本土化理论对于二元结构的处理,港台地区的成果也能够带来有益的启发,走向笔者所主张的“实用主义的后殖民研究”。